

(二)從國際書目控制看「中國編目規則」

吳明德

「中國編目規則」出版於民國七十二年，至今已有三年多的歷史。最初，圖書館界多半持觀望的態度不敢遽加採用，時至今日，這種態度雖然不復存在，國內大部份的圖書館也都據以編目。不可否認，對一些編目員來說，「中國編目規則」仍有若干未盡之處，對於它訂定的目的、格式、條文也有若干疑惑，“為什麼使用那麼奇怪的標點符號？”“為什麼要記載那麼多項目？”有些館員認為它不過是 ISBD 或 AACR 2 的翻版，甚至主張乾脆用 ISBD 或 AACR 2 來編目中文資料即可，不必另外新訂一個編目規則。國內圖書館界有上述的看法或疑惑，事屬難免，本文擬針對這些問題，從國際書目控制的觀點提出個人粗淺的看法。

新訂「中國編目規則」的目的在盧荷生教授所撰的「我所了解的中國編目規則」以及筆者的「從編目自動化看中國編目規則」兩文中已有說明，一方面是要因應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一方面是要達到便利國際書目交換的目標；再者，圖書館蒐藏的資料已不再侷限於印刷資料，編目規則自然也要反應這種現象。從這些目的來看，新訂「中國編目規則」應當是必然的趨勢。

不過，對於因應圖書館自動化業務這一點似有加以說明的必要。論者常以為圖書館自動化影響了編目規則的修訂。固然在設計編目規則時是考慮了圖書館自動化這個因素，筆者以為這兩者之間並無直接的關係。無論圖書館是使用 AACR 1 或 AACR 2，「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或「中國編目規則」，都可以進行圖書館自動化。也許我們只能說，由於電腦造成圖書館編目作業以及編目目的的改變，在修訂編目規則時自然會在條文中做適當的反應。

因「中國編目規則」所使用的標點符號以及編目條文與 ISBDs 和 AACR 2 相近引起的疑惑較多，這些都與前述“達到便利國際書目交換”的目的有密切關連。國際書目控制及交換是世人長久以來的理想，早在西元 1545-1555 年間瑞士學者就曾嚐試編輯世界性的書目，以後也有人做類似的嚐試，均遭到失敗，主要的原因在於各個國家本身的書目控制做的不夠好，或是標準不一致。至於近代，則有不少國際性的組織致力於這方面的工作。十九世紀末，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 Documentation (FID) 的前身 International de Bibliographie 就贊助蒐集各國出版的目錄、圖書館目錄、出版社目錄、書店

目錄等。1946年UNESCO成立，認為鼓勵各個國家建立及維持有效的國家目錄是進一步達成世界性書目控制存在的前提。ISO TC/46也在做類似的努力。不過，對國際書目控制貢獻最多的國際性組織當屬IFLA。從1927年成立以來，IFLA的活動幾乎都與國際書目控制有關，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活動是1969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國際編目專家會議（IMC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Cataloguing Experts），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每一個國家應該設立國家編目或目錄中心，負責該國出版品編目工作，產生的國家書目供國內外圖書館使用，在這個前提之下，當然每個國家都應該採用相同的著錄方式。此次會議，奠定了國際標準書目著錄（ISBDs）的基礎。其後，世界許多國家紛紛依據ISBDs修訂編目規則。

「中國編目規則」的編訂，無疑也是受到ISBD所追求的書目著錄國際標準化的影響。ISBD藉著下列三種方式達到幫助國際間書目交換的目的：

- (1)使不同來源的書目記錄得以互相交換。一個國家產生的記錄容易被另一個國家的目錄或書目容納。
- (2)超越語言的障礙，幫助解釋書目記錄。為某種語言的讀者產生的記錄能被使用其他語言者利用。
- (3)幫助將書目記錄轉換成機讀形式。

對國內大部份圖書館來說，似乎不能想見上述的目的及方法對它們有什麼意義。的確，國內許多圖書館收藏的資料以中文佔絕大多數，很少有機會要使用到其他國家的書目或目錄。在這種情形下，要求國內圖書館遵守「中國編目規則」，而其目的之一却是渺不可及的“幫助國際間書目交換”，這種作法似乎不太妥當，但是事實絕非如此。

圖書館編目時如果不擬利用他館現成的編目資料，也不打算參與聯合目錄計畫，自然無須採納其他圖書館所用的編目規則。對大部份圖書館來說，為了節省編目的人力，也為了讓別的圖書館能分享編目資料或館藏資源，採用標準的或被多數圖書館接受的編目規則是最佳選擇。一個國家的圖書館當然最好採用同樣的編目規則，為了“國際間書目交換”，是否各個國家的編目規則也應相同？就前述IMCE的決議來看，它要求各國採用一致的著錄方式，如能做到這一點，對於書目資料的交換當然有莫大的幫助。筆者以為，各個國家的編目規則或著錄方式應當考慮到本國出版品的特性或一些特殊的要求，但在進行國際間書目交換時却必須使用同樣的編目規則或著錄方式。

本文第一段曾經提到國內有些館員對「中國編目規則」有些疑惑，認為可

以 AACR 2 替代，可能也有些館員會質疑，為什麼「中國編目規則」未完全遵循 ISBD？前面說過，每個國家出版品的特色或編目傳統不盡相同，要強求各國採用同一編目規則或著錄方式確實不宜。以 AACR 2 的著錄部份來說，並未與 ISBD 完全相同。我國出版品書名頁記載資料不多，如依 ISBD 或 AACR 2，則著錄時要使用許多方括弧，非常累贅。我國出版品當然還有其他特色，此處不擬詳述。僅就 ISBD 發展的過程來看，也可明瞭「中國編目規則」無法完全遵循 ISBD 的原因。不可否認，歷年來 IFLA 主持的編目原則或標準訂定的會議幾乎都是歐美少數國家積極參與完成的。例如 1969 年在哥本哈根舉行

IMCE 所成立的工作小組是由五個西歐國家及美國代表組成。ISBD (M) 出版後於 1973 年在 Grenoble 所舉行的修訂會議，仍然主要由歐美國家參與。在這種情形下，有關書目控制的做法與原則，自然是以羅馬語文或以羅馬語文的出版品為對象。因此，「中國編目規則」與 ISBD 有若干差異是無法避免的。即使就 IFLA 的國際書目控制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計畫來看，它也認為雖然書目控制一致性的呼聲很高，但是還是會有因語言或文化而影響到國家書目傳統的一些特殊之處，這種存在的問題並不會阻礙國際間資訊交換系統的發展。UBC 所要求的是一致性，但也不是一成不變沒有彈性的規則，基本的原則是國際間能接受的，而某些情形是允許各國間有所差異的。

在國際間文化交流或書目交換甚為頻繁的今日，我國自然不能置身度外。一方面要考慮國際書目交換，一方面又要顧及我國出版品的特色等等，「中國編目規則」研訂之時確實面臨難處，也因此造成國內一些館員對它的疑惑。為了配合 ISBD 或 AACR 2，「中國編目規則」採用了含標點符號的著錄格式、採用了依樣著錄的原則等等。對於不會與國外進行書目交換的圖書館來說，是不是在採用「中國編目規則」時能有更大的彈性？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舉例來說，國內一些圖書館對於「中國編目規則」所使用的標點符號不以為然。的確，這些標點符號與我國平常所使用的標點符號並未具備相同的意義。ISBD 採用這些指定的標點符號主要是使書目資料的著錄能超越語言的障礙，即使不識某種語文的人也能辨認。這個特性，在書目資料以印刷形式傳遞時也許很重要；但是，如果書目資料以機讀的形式傳遞，指定的標點符號就不那麼重要了。以 Chinese MARC 以及 UNIMARC 格式處理編目資料時，指定的標點符號是不輸入的。因此，國內如有圖書館不喜歡「中國編目規則」所用的指定標點符號，儘可省去不用，仍採用舊規則使用空格區分著錄項目的方式。這樣是不是就不能享用國立中央圖書館所印製的卡片了？其實，國立中央圖書館目

前運用電腦處理編目資料，只要做適當的調整，應可同時印製使用及不使用指定標點符號的卡片。而這些圖書館如果要提供編目資料給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便編製聯合目錄，也並不會牽涉到指定的標點符號的問題。

依照 IFLA 的國際書目控制計畫及 ISBD 的目的看來，國際間書目交換的活動是由各國的國家書目中心負責。這個機構負責將該國出版品的書目資料供給其他國家使用，也負責將國外的書目資料供給國內圖書館使用，在交換過程中所依據的標準，在目前看來應該是 ISBD 和 UNIMARC 最為恰當。

由於國際間書目交換是各國國家書目中心的責任，以我國來說，自然是由國立中央圖書館來負責最適合。嚴格地說，國立中央圖書館依照「中國編目規則」所產生的書目資料如果不做適當的轉換並無法讓其他國家的國家書目中心完全接受。當然，這種轉換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前面已經說過，訂定「中國編目規則」絕不能忽視我國出版品的特色或編目傳統，同樣的，我們也不能忽略國際書目交換的重要性。只是，這兩種考慮要如何並行不悖仍待國內圖書館界同道研究，在國際書目交換以機讀形式為主的今日，未來如要修訂或新訂中國編目規則，似乎應以能使我國產生的書目資料能夠很容易地藉助電腦程式轉換成符合國際標準為原則。這個編目規則也應能給予國內圖書館更多的彈性選擇，但又不會影響或阻礙書目資料分享甚至於國際書目交換。筆者當年有幸參與「中國編目規則」編訂工作，撰寫此文，主要的目的是對它與國際書目控制或標準化的問題提出淺見，並對它未來修訂的原則表示不成熟的看法，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參考書目

盧荷生 我所了解的「中國編目規則」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33 期（70 年 12 月），頁 13-16。

盧荷生 編目之任務首在傳達「資源」的訊息——兼論「中國編目規則」之原則與應用 圖書館事業合作發展研討會 75 年 8 月，35 頁。

吳明德 從編目自動化看「中國編目規則」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33 期（70 年 12 月），頁 17-23。

Anderson, Dorothy. 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 München: Verlag Dokumentation, 1974.

Davinson, Donald. Bibliographic Control. London: Clive Bingley, 197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taloguing Principles.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Annotated ed. London: IFLA Committee on Cataloguing, 1971.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Cataloguing Experts, Copenhagen, 1969. Libri, 20(1-2), 1970.

ISBD(M):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for Monographic Publications. 1st standard ed. rev. London: IFLA 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UBC, 1978.

Verona, Eva. A Decade of IFLA's Work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Jan./Mar. 1980, p.2-9.

Wijasuriya, D.E.K. ISBD Application to Asian National Bibliographies. Unesco Bulletin for Libraries, 31(4), p.223-232, July/August,